

维多利亚女王

〔英〕李顿·斯特拉奇著 李样年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维多利亚女王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46895

1146895

QUEEN VICTORIA

By

Lytton Strachey

据 The Continental Book Company AB
STOCKHOLM / LONDON 1945年版译出

维多利亚女王

〔英〕李顿·斯特拉奇著

李祥年 译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插页：5

字数：182000 印数：1——13000

ISBN 7—5401—0255—5

I·194 定价：2.35 元



维多利亚女王登极一年后之肖像(1838)
作者詹姆斯·海特 (James Hayter) 现藏伦敦国立肖像画廊



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



维多利亚女王（摄于1842年）



维多利亚女王与约翰·布朗



维多利亚女王（摄于1900年）

献 给

维吉妮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752-1957

书内述及重要史实之根据将于脚注中注明。参考书全名列于书末之参考书目。

著者感谢大英博物馆董事会特许参用格里维尔回忆录手稿若干未刊部分。

前 言

—

相对说来，英国的传记文学起步较晚，至中世纪方稍见起色，但描写范围多局限在教堂和修道院，传记主人公大都为圣徒、殉教者、院主、主教一类的人物。而且，英国中世纪很多这一类的传记是用拉丁语写的。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十五世纪以至十六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范围及形式至此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拉丁语依然被当作主要的表现媒介在传记写作中经常使用。

十七世纪以至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传记文学创作起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内容进一步从宗教领域以及国家最上层领域扩展开来，一大批文士、学者、社会名流进入了传主的行列，其形式也逐渐从以往描写圣徒、君主的刻板、拘谨的形式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传者们开始注意到在描述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同时也认识到人物的性格不仅在严肃的场合和事件中，而且在日常琐碎的细节中同样可以表现出来。而“传记”(Biography)一词，也是在这一时期在英国第一次见到使用。富勒(Faller)在其出版于1662年的《英国伟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中提到“这些圣人们的传记”；德赖顿 (Dryden) 则于1693年给“传记”下了一个定义，他称之为“杰出人物的生平史。”

英国传记文学真正起了较大变化的时代是在十八世纪末。这一变化中的代表作家是詹姆斯·鲍斯威尔 (James Boswell) 他于1791年出版的《约翰森博士传》(Life of Dr. Johnson) 使得沉闷的英国传记文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一位优秀的传记作家及其传记，不仅要求能够对传主的生平以及其权威性的文献有着全面的了解的第一手的掌握，同时还要求能够对传主的性格有着深刻完整的理解，对他的言行举止的心理动机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能将传主以至自己的丰富情感最高程度上地传达给读者。而鲍斯威尔正是将这些素质集于一身，并集中体现在了他的《约翰森博士传》中，使之成为英国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十九世纪的英国传记文学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受到鲍斯威尔的影响，一些传记作家在传记写作中更为重视传主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在种种琐事中所表现出的性格，同时他们还更为注意到与传主发生关系的间接材料的搜集和运用。这些都为十九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却是造成了一些传记之作越来越冗长庞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对于传记文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大多数传记作者，在进行传记写作的过程中，着眼点仍然主要放在对传主德行的颂扬上，并不重视对其个性的刻画，从而使这一

时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传记主人公，往往仅为某种道德模式的化身，而缺乏生动的个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传记文学至此尚没有最终挣脱传统传记观念的束缚。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二十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又一朵奇葩——李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二

李顿·斯特拉奇毕业于剑桥大学，与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德国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同为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家。斯特拉奇于191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传记集《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流》(Eminent Victorians)。在这部传记集的前言里，他对英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传记文学主张。他写道：“在英国，传记的艺术似乎乃为一个不幸时代的产儿。尽管我们确实有过几部杰作，但是我们却从来未象法国那样，有过伟大的传记文学的传统。……对我们来说，这一写作艺术各个分支中最为精妙而高尚的艺术门类一直被贬在雇佣文字的屈辱地位，我们没有考虑到写出一部好的传记可能会象实际的人生一样艰难。以往那些被我们习惯于用以纪念死者的那两大卷巨制宏作，其生硬的材料堆砌，马虎的文风，冗赘的谀辞，选材及独见的极端贫乏，有谁还不知道？它们正象那出丧的行列，笼罩着同样迟缓而哀伤的气氛。人们不禁会想，

它们中的某部会不会是作为丧仪的最后一项，由殡仪人员创作的。本书中所作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受惠于那些真正称得上标准传记的作品。因为它们不仅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必不可少的资料，还为我提供了更为宝贵的东西——实例。从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是多么多呵！这里不必一一评述。举例来说，要保持适当的简洁——一种排斥一切冗赘与琐碎的简洁——这确实是传记家的第一要务。传记家的另一要务无疑便是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唱赞歌并非传记家的职责，他的职责是按照他对事件的理解来揭示其真象，这也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致力于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平心静气地，不偏不倚地去揭示事实的真象，此外别无他意。”斯特拉奇的这种传记文学观，在其以后的传记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继《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流》以后，他又创作了《维多利亚女王》，《伊丽莎白与艾赛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 1928)《人物小肖像》(Portraits in Miniature 1931)等传记文学作品，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维多利亚女王》。

三

《维多利亚女王》出版于1921年。它所描绘的历史，涉及了自十九世纪初叶至二十世纪初维多利亚去世(1901年)纵横几乎一个世纪的英国史以及欧洲重大的历史事件。传记主人公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出生，1837年即位，1901年去世，有着八十余年的人生历程和在位六十多年的女王生涯。这个时期

的英国，政治上，由于自由党与保守党两大派系相互牵掣发展而来的典型的议会政治已经确立；在经济上，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在各个工业部门显示了它的实绩，尤其在纺织业中，大机器生产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加上对外扩张的结果，大英帝国走上了她“日不落”的国运昌隆的顶峰。这一切，正完整地表现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个典型的全过程。而这一时代的维多利亚，其八十余年的人生，既和英国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又有着其历经孩提，少女，女王，妻子，遗孀，祖母等不同人生阶段上的具体丰富性，因而可以说是几乎和所处时代本身一样绚丽多彩。

历史和人生两个方面上如此丰富的内容，斯特拉奇的这部《维多利亚女王》仅以一卷十章的篇幅，便为我们作出了洗炼，集中，生动的概括与再现，这在冗长繁琐之风见涨而不衰的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传记文学的创作中，已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称誉，而《维多利亚女王》之成为英国乃至世界传记文学的创作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的原因及其意义，似乎还不仅仅在于此。

我以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维多利亚女王》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有关伟人的传记写作中讳恶扬善，一味歌功颂德的传统。在这部传记中出现的大英女王维多利亚，不是一个头罩灵光的神明，她首先是一个鲜灵活跳的“人”：热情，坚定，而又时有偏颇，固执；聪颖，敏锐却又单纯，简单；时时准备履行对国家的责

任却又常常认不清时代的潮流；处处维护王室的权威却不知道在她的时代王室已无实际的权力……”所有这一切，贯穿了她八十余年漫长的一生。而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上，又有其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丰富表现。斯特拉奇在丰富地占有资料的同时，抓住了维多利亚性格的这些主要特征，写出了它们在时代进程中的丰富变化，尤其是结合了女王具体的人生环境——这些类似的环境在以往的伟人传中一直是个禁区——来进行描绘与刻划。譬如他写了女王拘谨而沉闷的少年时代，也写了她活泼享乐的青春年华；写了她热烈执着的爱情，也写了她中年居孀的痛苦；写了她作为“统御七海”的大英女王的种种喧赫，也写了她作为儿孙绕膝的祖母的种种慈爱……在描写中，传记不仅写出了女王所施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影响，同时也揭示了女王内心世界的矛盾，剖析了她一切社会活动的心理契机。既写出维多利亚作为女王的种种辉煌的一面，也不回避她作为普通妇女的种种特点以至弱点。因而在这样的描写中，表现出的性格是真实完整的性格，人物是真实完整的人物，人生是真实完整的人生。

其次，在解决传记写作如何把社会时代的发展同传主具体的人生进程严密而生动地融为一体的问题上，《维多利亚女王》树立了一个突出的典范。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六十四年（1837—1901）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它几乎可以用来概括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由肇始到顶峰的全过程。而维多利亚一生的八十二年，则又是作为一个人所望得到的经由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

以至老年的最为完整而丰富的人生。怎样把一个如此辉煌的时代和一个如此丰富的人生紧密无间地融汇为一个整体，这可以说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更为困难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王室地位的升降和英国国运的盛衰，在事实上并没有取同一方向，而维多利亚本人威望的沉浮和王室地位的变化似乎也并没有取同一步调。正如作者本人也认识到的，“从1840年到1861年，君主的权力逐渐地增强，从1861年到1901年它又逐渐地衰弱。前一个时期归功于阿尔伯特亲王的影响，后一个时期则得力于一系列的首辅大臣。在前一个时期维多利亚实际上仅是一个附庸，而后一个时期，阿尔伯特苦心罗致的权柄，又无可阻止地落入了格拉德斯顿，比肯斯菲尔德，和赛里斯伯爵等要臣的掌握之中。……在其王朝的末年，王权已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衰弱，而极为矛盾的是，维多利亚本人却因为对政治发展的赞同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颂扬，对这种发展假若她完全明白了其重要性的话，定会给她带来极大的不快。”

（见本书第九章）斯特拉奇成功地解决了以上难题。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经济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明了的认识。这样，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英国王室和女王本人放在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上，并时时把握了英国政治经济的变化和王室及女王地位的相应变化。其次则应归功于作者严谨的历史态度。斯特拉奇是明了英王室以及维多利亚本人同英国时代政治的发展间所存在的矛盾（原著中用“Paradoxical”甚至有“乖谬”之意）的，但是他并没有为强求女王与时代的一致，为获得本书在描述中表面上的统一而回避以至